

澳華新文苑

第1242期(A)

反思多元文化



20世紀的1973年，澳洲政府正式廢除被執行了72年的白澳政策，並代之以多元文化政策，還於1975年通過了反對種族歧視的法案。在從那以來的這47年裡，多元文化政策在維護原住民和少數族裔的利益及推動社會和諧發展方面取得了全民公認的成績。

然而，21世紀前後至那以來的西方，在一股“白左”逆流的影響下，多元文化成爲一種“馬賽克保護傘”，並對超額移民、綏靖原教旨、放縱文化平行、滋生文化對立和無政府主義等等方面發揮影響，導致社會出現了可識別的倒退趨勢。對此，荷蘭、德國、法國已經看到嚴重性並開始致力於推動文化融入政策。英語國家中目前只有美國開始強力消除白左思潮、大力收緊移民和整治無政府主義。英、加、澳、新等國家卻相對遲疑，還在“文化馬賽克”中觀望，或採取“腳痛醫腳”的實用主義。

目前，對西方國家又特別是對澳洲這樣正式提出過多元文化政策的國家來說，改革文化政策的時刻已經到來，那就是需要結束多元文化單一政策，並明確推行在融入政策指導下的多元文化包容。融入政策是建立在本國歐洲血統和普世價值爲核心的歷史和現實基礎上。文化包容主要是對移民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然維繫的少數族裔文化的包容。

融入在客觀上是雙向的，但並不是對稱的。移民在飲食、藝

術、運動和保健等方面帶來了一些被全民共用的文化，這是融入的一種方向。而移民必須接受本國法律、教育、經濟活動規則和社會主流價值，這是融入之更加重大的使命和方向。

事實上，從每一批移民的第三代開始，其本族意識會自然淡漠；其自我認知會是擁有主流價值的澳洲公民，其會主要講英語甚至只講英語，而不論其家人和外界對其有什麼偏見。所以，多元文化作爲單一文化口號的弊端是給社會打上文化“馬賽克”，並留下文化平行和抱圈的社會退化空間；而在社會主流文化的引導下實現不對稱的雙向融入，是澳洲未來不得不作出的政策和口號調整。

“多元文化”雖然是主流社會對少數族裔文化的包容，但這種包容並不是無條件的，更不是無限的。澳洲原住民所享受的文化自由和各種優惠政策雖然和多元文化有意義上的重疊，但並不完全屬於多元文化的範疇。澳洲近年來從歷史和道義的層面給予原住民權利更大的支持，並得到了其他族裔的認同。然而，要正式將原住民置於其他各民族地位之上的准立法全民公投卻並未能獲得通過。這說明澳洲關於民族平等和公正的主流價值是高於任何單一族裔的價值和訴求的；這也是維繫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人權和民族權利平等不是融入的障礙，而是推動融入的動力，是消除任

何族裔特殊化藉口的良藥。

其他移民族裔雖然和原住民不同，但也享受到語言和職業培訓、醫保服務、失業補貼和求職幫助等切身照顧，這也是文化包容政策給他們帶來的社會地位和利益。作爲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應該意識到，這些不是他們當然享有的，而是澳洲作爲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之一員所努力確保的各族人民福利。他們既然用腳選擇了澳洲，就應該熱愛這個國家的核心價值，把文化融入作爲努力的方向。

也正因為以上，多元文化存在的理由和存在時間的長短，均會取決於各個移民族裔帶給主流社會的影響及其回饋：是否有助於社會團結與和諧發展？是否有助於澳洲價值的維護？是否減輕了國家的經濟負擔？是否接受以歐洲血統爲核心的國家認同？

最後這一條既現實又急迫。澳洲和歐美國家一樣，是以歐洲血統爲核心的國家。這是歷史鑄成的存在；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主動放棄其主流血統的核心。這也是維繫主流社會傳統文化的必要，是難以動搖也不應該動搖的。除了種族混雜的小國家；除了不可抗拒力量之強行干預，少數族裔特別是其第一二代新移民，都需要冷靜地接受這個現實。

據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的某些研究，一個國家的單一少數族裔如果在人口上占到全國人口的16%並在生育率上超過社

告別 郭志宏

寫給最先與Bondi Beach恐怖襲擊槍手搏鬥卻倒在槍彈下的Boris Gurman和Sofia Gurman。

有一種告別
純淨如水
洗滌著罪惡
用生命之血

那最後的一搏
告訴世界
澳大利亞這塊有溫度的土壤
可以爲愛泣血



2025年12月14日，悉尼邦岱海灘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兩名槍手朝聚集的人群開火，造成嚴重傷亡。43歲的水果店經營者阿邁德·阿爾·阿邁德（Ahmed al Ahmed）挺身而出，冒死衝向其中一個槍手並成功奪槍制止行兇，卻在隨後遭另一名槍手開槍擊中，被緊急送醫。其英勇畫面曝光後感動全球。

會平均水準，那麼這個民族超過全國人口半數的最短時間只需50年。無論這些資料是否正確，部分歐洲國家的人口組成正在顯現類似的變化趨勢；個別少數族裔甚至出現謀求取代白人血統核心的蠻橫口號。

在此形勢下，澳洲政府和各族人民必須做出自己的時代性選擇。要想未雨綢繆，就要防止移民超額，就需限制族裔特權和調整可讓法制失控的政策。比如，一個少數族裔反對另一個少數族裔的遊行是否應該不被批准？凡是違背澳洲主流價值，違背人性、平等和法治的言論和行爲是否都不應該被姑息？而那些以多元文化和言論自由的名義危害社會生活與公共安全的言論

和行爲是否都需要被遏制？對嚴重違背者是否應給予堅決的懲治？

作爲少數族裔的成員，比如作爲華人的我們，要理解國家血統核心的現實；要擁護澳洲建國214年以來在英國和西方主流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現代文明成果；並共同維護平等公正和自由民主的主流社會價值觀。我們華人應該在學習英文、遵紀守法、融入社會、參與公共活動和參政督政方面取得不亞於其他少數族裔的成果。我們作爲澳洲人口5-6%的族裔，在不對稱雙向融入澳洲社會的行動中是否應該作出優異的成績？

（寫於2025年12月24日）

行邁

簡談吳正的中篇小說集《情迷雙城》

（接上期）《後窗》裡的范大塊頭被抓走時“50年代初的上海，抓人與抄家是件帶點兒神秘、恐懼兼刺激的事。連頑童們之間也常有如此侃法：叫僕阿伯（父親）去派出所‘談談’。以‘談’之下便永久消失蹤影的情形在當時相當普遍，而范大塊頭就是這樣的一個個案。……他被從黑漆大門間推出來的時候，手是反鏢的，員警左一個右一個地扭住了他的臂膀。”而范女人“她掩面而泣，縷縷長髮從前面將她的面容遮著，活

像隻美麗的女鬼。”

關於范小妹揭發批判她母親范女人是這樣寫的：“批鬥會的高潮是隨著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跳上臺去。對著被批鬥物件‘啪啪’地抽了兩下耳光而開始的。這是一個穿著一身女軍服、紮著一條馬尾散辮的姑娘，白晳俊俏的臉蛋酷似她的母親。她的揭發自然會很有說服力，而且很系統，……”在那個人妖顛倒的年代，很多人就是因爲親人的背叛劃清界限而完全絕望走向不歸之路的，范小妹揭發、打罵母親這樣的事情在那個年代比比皆是，人性的惡在那個年代達到了極點。

我們知道小說裡細節的成功描寫非常重要。巴爾扎克曾說過，小說雖然是：“莊嚴的說謊”，但惟獨對細節描寫，卻來不得半點的虛假和做作。也就是說，如果細節也是謊言，小說就會立即失信於讀者。看來，十分不起眼的細節描寫，竟然成了支撐小說人物的“擎天大柱”。細節的“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帶來了小說人物的“活”。也就是說，

精彩的細節描寫，可以讓其熠熠閃光，使作品中的人物煥然生色。所以，對於細節描寫，不管人們對其重要性的認識有何不同，但人們都是一向予以重視的。吳正的小說《姐妹》裡有一個細節，華福記車行的華老闆讓其最爲得意的就是在德國洋行買下的二手貨千斤鼎，這個千斤鼎是他愛不釋手的寶物，是他情有獨鍾的偏愛，陪他在私人車行裡修車時無比的風光。後來1956年公私合營時，華福記車行和其他幾家同類同規模的私營車行實行合併，成立了“上海第X汽車修理廠”後，千斤鼎又在汽車修理廠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雖然隨著公私合營他的車行沒有了，可他在汽車修理廠每天還可見到他的千斤鼎，他還可用這個千斤鼎去修理汽車。吳正在小說中有意識地將千斤鼎反復出現，寫出了華老闆對這個千斤鼎的情之所鐘，千斤鼎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一開始就埋下了一個伏筆。而就是這個千斤鼎隨著他來到了文化大革命，

華老闆在對這個世界絕望自殺時，他選擇了讓他的屍體躺在了千斤鼎下層的上面。

關於華老闆在他人生最後的階段，小說是這樣描寫的，“他用他身上僅有的幾毛錢去一家雜貨小鋪買了一瓶二兩半莊的‘七寶大麵’和幾瓶‘敵敵畏’藥水。他攜帶著這些‘作案工具’，熟門熟路地從後窗潛入了鳳陽路141號底層的修理車間。……後來人們見到的現場是：一隻空酒瓶和四隻空藥瓶東倒西歪地丟棄在地上。人們只知道：他應該是在下半夜裡某個時辰一口氣喝下了這幾瓶液體。然後，然後他去了哪裡了呢？活不見人，死不見屍。……那台20世紀30年代德國製造的‘千斤鼎’‘噁噁’地叫喚著，將華師傅的軀體從地底下抬升了上來。人們發現，屍體已經全身發黑，且已腫脹不堪。”文化大革命時期自殺身亡的比比皆是，在那個時候上海的自殺多以從高層樓上一躍而下，而像華老闆死在自己的千斤鼎上實屬罕見。

再例如，槍斃畫家薛強的那天：“那個冬日的清晨，冷風颼颼。他從監房中被押解了出來，綁赴次寧刑場，執行槍決。同時被綁赴刑場的還有其他六七個人。大家都面朝天，跪成了一排，等待處決的槍聲響起。……槍聲響了，他閉上了眼睛。……過了很長一會兒，他才將自己的眼睛慢慢地睜了開來。但他見到的還是那座與他面面相對的黃土堆，而冬日的晨陽仍在頭頂之上明晃晃地照耀著。……他被告知，從此以後，你不再姓薛了。你改姓熊了。”原來，在那天被處決的名單中，薛強毫無疑問是名列其中的。唯一一個叫熊志新的，是法場的陪綁者。……就這麼神差鬼使地，他們錯殺了一頭熊，卻保住了我的這條狗命。”

在那個年代這樣荒唐的事情多著去了，所以讀者讀起這段誇張、荒誕的錯殺事件時感到非常真實可信。吳正先生爲什麼在寫作時頭腦如此清晰，能將如此

血腥、殘暴的歷史寫得這麼入木三分，這與其小時候坎坷的經歷和扎實的寫作功底是分不開的。他在他的《靈魂的安放處》告訴我們，文革開始後的一天，我們家被抄家後，因爲其父去了香港，那天晚上他母親拉著他一同跪在地上做禱告。這些切膚之痛一般人是無法體會的，只有親身經歷過那個特殊的年代，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遭受過磨難的人才能將那段記憶真實地從自己的筆下流淌出來。

吳正先生說其靈魂的安放處有三個：宗教、故鄉上海以及文學。在研究吳正小說的時候，這是我們正確把握他作品內涵的關鍵，只有抓住了這一點，才能知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寫。

“老去又逢新歲月，春來更有好花枝。”我們期待著吳正先生在他靈魂的安放處爲我們獻出更多更美的篇章。

（參考文獻：《情迷雙城》，吳正著，瀟江出版社；《小說技巧》，傅騰霄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趙旭

